

大學的理念

貓頭鷹

成長的價值有時是很模糊的

大學本質的改變是中西方皆然的事，在資本社會發達的國家裏，這種現象尤其明顯，工業科技所需人才來自大學校園的培養，這種關係在意義上古今並無不同，只不過在界限和距離上，這樣的人才供給上已成了「速食方式」，專精分工日益繁鎖，大學內的科系不得不繼續作細分，以「隔行如隔山」的觀點來看，這未必是好現象，主要是針對大學理念及其精神內涵所負擔的重要意義而言，我們引以為憂。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例，其所設課程竟達一萬門之多，內容五花八門。我們不曉得這一萬門課是多少科系的總合，但至少在國內，我們可能還碰不上這樣驚人的細分程度，或許這應該是在研究所裏才應有的現象，卻先行移植到大學裏。金耀基管他叫做「綜集大學」，好比一個綜集大學，我們無法看出它和一般專科學校有何差別。我們更無法否認它是個名副其實的「職業培訓所」。這種「職業培訓所」的定義，就差在一個重要的觀念上——把知識和實用擺在什麼樣的位置上。知識當然是為了實用，但

你如果汲汲於實用的程度，一拿起書本就專挑裡面有用的部分，那無疑褻瀆了大學的功能。「為知識而知識，為真理而探索」這種為一般人視為高調的主張，無疑地正是建立在一個「單純求知慾」的基礎上。

知識爆炸的時代裏，如洪流湧現不絕，社會變幻腳步是一夕間的事，豈是我們生活在狹隘校園裏能全盤得知，其實在資訊交流發達的今日，得知社會訊息已不是難事，甚至我們要擔受這種過度吸收的害處。所謂過度吸收的意思即：好壞兼不拒，如果僅是在資訊媒體上吸收這是有必要，但未必非得親自去參與或體驗，否則似乎已踰越了的範圍。我們需得承認，在校園所學習的知識不敷將來踏入社會所用，經驗層面不用說，理論知識當然不足，這豈非課程安排所能補救的，如果在學時候就憂心種種地想到將來，那社會上衆多補習教育提供充實的機會，犯不著非得硬要在課程裏加入這些東西。好比進入國中前的小學生，他在課餘補習英文，但進入國中後未必英文成績就比沒有補習的人

好，同樣地在社會這條百米道上，每個人起跑點或許不同，但不能保證誰就一定比誰跑得快。

這種想法或許過份理想化了，但大學本質卻是變遷了。而且傾向於物質文化逸樂的享受。

台大教授楊國樞曾做過一項研究，把同一份問卷對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做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的價值觀轉變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社會約束與自我控制的價值降低。二是行動為樂與進步是尚的價值降低。三是自我縱容與感官享樂的價值增高。

這是資本社會高度經濟文明的發展所導至的強然現象，但我們也不要忽略共產世界國家的大學情況更糟，極權國家裏，學校只是統御政司使用的技術工具，沒有所謂自主獨創的精神，當然也有例外的情形發生，那就是極權世界正拉開鐵幕之時。

我們看下面這段話大概可以了解學校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在西方風起雲湧的學生抗議運動的出現，其根本的原因是，學生感到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學校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訓練它所需要的技術知識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學生變成服從學校的物化關係的勞動商品，再生產勞動力的過程和生產過程一樣，具有同一的非人化的屬性，而不考慮學生身體的需要和具體慾望，大學的批判和文化的功能也就消失了。

大學是會思考的社會首腦

其次我們談到社會學校的關係，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有一段距離最好，如果以「象牙塔」來比喻似嫌過度嚴重些，大學精神所應該強調的重點應該是：學術獨立、研究自由。牽扯到政治的層面不談，無可否認今日教育普及，知識水準普遍提高，大學在社會上所占的知識地位，或許不再是像從前那樣高，因而失去了它對社會的主導性，此非大學之罪也，乃時勢之使然，大學不再是向社會輸出知識，相反地，學生不時地自社會吸收現代訊息，書本顯然已不敷使用。所謂對社會主導能力，也就是如果把社會比喻成一個有機體，則大學就是一個會思考的首腦，這種優勢現象在極權世界可能還看的到，主要是因為極權國家的政司要人民思考愈簡單愈好，只要具備專精技術即可，以便利於使喚人民，故大學生常為社會運動的火車頭。大學風貌改變了，大學地位低落了，我們不得不抱持悲觀的態度。

很多人提到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時，都反對大學生的反省擺在政治參與，而改在生命的存在。他們所持的理由之一是因大學生本身學識素養不夠，二是大學生在社會仍居於無有（Have-not）的地位，對社會只有理想沒有責任，沒有責任就不怕被抄魷魚或處罰。這種想法是十足的冷漠主義加鴛鴦主義。我們不知道一個在追求理想的人還必須考慮什麼責任問題。殷海光說：「當著他們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提昇進時，就常會下降到受生物邏輯的作弄。」那也正是原則淪喪的時候，無可奈何地，爲了追求某些東西，我們必須放棄某些條件，否則知識份子何來的勇氣和風骨。我們也不必陳義過高，但在社會各階層中，只有大學生是最具備革命情緒和浪漫主義色彩，是社會改革的原動力。無關知識素養的程度。

大學生不等於知識份子

真正的「大學理念」究竟指何事呢？一般所以西方大學精神作解釋，中古世紀歐洲大學是以知識傳授爲主的，大學是很重視固有文化的保存，這是一個專注浸淫於學術的環境，形容爲「學術象牙塔」也不爲過，在貴族學校裏，尤其明顯，我們可能懷疑這樣教育出來的大學生遲鈍愚腐，能否適應或符合社會需要，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今天的我們所能解答。在中國社會中，也有人提到中國東漢的大學生可爲相應，但是如果我們想到中國讀書人熱衷功名，貪祿趨勢時的醜

態，就必須仔細考慮。

我們不能否認政治和學術的關係，是有牽制的作用存在，是故「官學兩棲」不應該存在。

把大學生說成知識份子，等於把兩者劃上等號，似乎不是很恰當，「知識份子」應是生活在思想中的人，這是基於「大學理念」的觀點加諸於大學生的期望，既然是知識份子最好是併除「拜金主義」、「逐利主義」隔離而不封閉，大學生不需要養尊處優，也不需要自命天之驕子，但是我們應避免過度世俗所帶來的危機。如果我們可以把校園當作一個「次文化」則社會文化和校園文化可以是互相衝突的，赫胥黎說：

我們也不可將文化弄的單調和整齊劃一。……文化內容的多彩多姿，無論是在整個世界或在各個國邦，乃人生的香料。

這個論點本來是來解釋世界上各個國家文化的問題，但我們基於文化的創造力及激發力而言，將之運用在社會文化和學校文化的關係。如果校園和社會沒有一定程度的界限存在，那社會的前景將是暗淡的。

我們的虛無起因於價值觀的迷失，我們的惶恐由於對人生前景的幻滅。但無論如何我們的價值觀決定一生的追求，把一件事的定位在何方，全憑我們理性的判斷，談到這兒，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大學給了我們一把鑰匙（針對知識），也帶給我們一把解剖刀（社會），全憑你有無視於它們的存在。